

阜阳地区计划志

阜阳行署计划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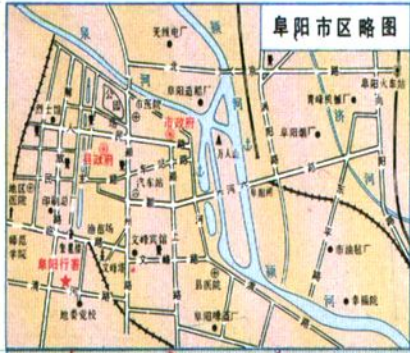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三年十月

阜阳地区计划志

阜阳行署计划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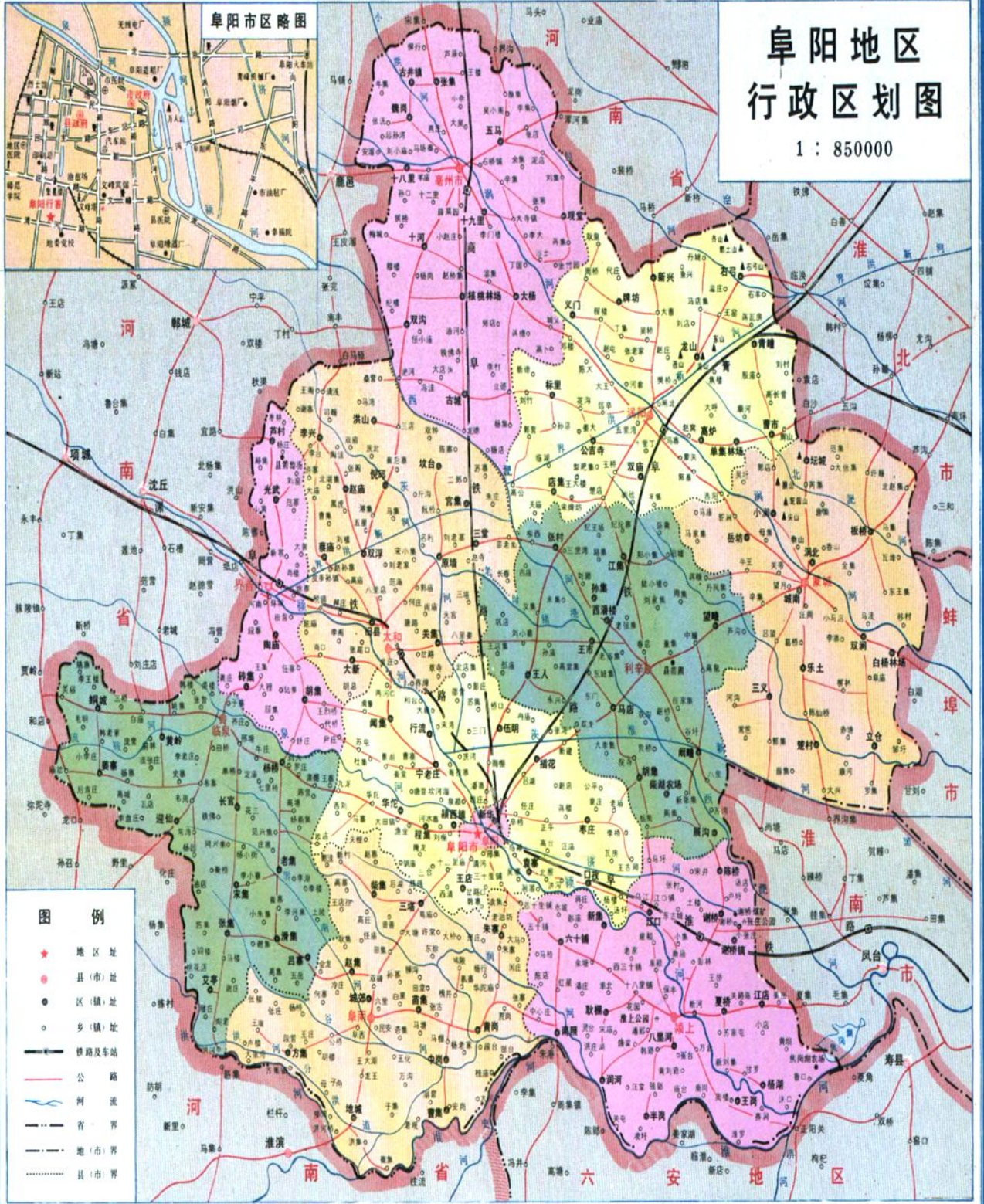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三年十月

阜阳市区略图



阜阳地区 行政区划图

1 : 850000



图例

- ★ 地区址
- 县(市)址
- 区(镇)址
- 乡(镇)址
- 铁路及车站
- 公路
- 河流
- 省界
- 地(市)界
- 县(市)界

阜阳地区行署计委机关地方志

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张朝仁
副组长 刘显章
成 员 李朝良 汝有义 张国强 闫松华

《阜阳地区计划志》编纂人员

总编审 燕广义 李全阜 张朝仁 汝守森
主 编 张朝仁 刘显章 李朝良
副主编 王 虎 李祥亮
编 辑 李朝良 闫松华 李祥亮 王 虎
郭长峰 马光明 李怀平 刘 军
制 图 邹家舜 饶玲华

阜阳地区地方志办公室

关于对《阜阳地区计划志》的审查意见

行署计委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

《阜阳地区计划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风朴实，语言简炼，专业特色突出，是一部较成功的专业志稿。

此志编写不易，十分宝贵。建议铅印成书，以发挥其社会多方面的功能，并传之后世。

安徽省阜阳地区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3年9月8日

序 言

编纂《阜阳地区计划志》，是按照行署领导关于做好修志的部署和在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从1992年6月开始组织人员搜集资料，翻阅历史档案，调查走访知情人士，继而整理编写，历经一年，于今年6月完成初稿。全书共5章，17节，约7万多字。比较全面、客观地综述了阜阳地区建国以来36年间（截止1985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计划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教训，记述了各个经济计划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向、方针、政策、任务、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计划完成的情况，简述了计委的机构沿革和领导人的更迭。

《阜阳地区计划志》以大量的数据和丰富史料表明，在阜阳地区经济发展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后的36年，是阜阳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经济建设发展最快，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36年；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的36年；也是不断克服困难，纠正错误，艰难曲折中发展前进的36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人民精神振奋，各行各业都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开拓新的局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阜阳经济作出了贡献。

《阜阳地区计划志》，是根据阜阳地区历史发展状况，尤其是建国以后的发展现实，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叙述、综合对比，编写而成的。它立足当代，略溯近代和古代，做到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点，力求起到“求实存史”和供领导决策提供依据的作用。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编纂新方志，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还可以

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義重大的事業。”總書記的指示，精辟地闡明了編志工作的宗旨和重大意義。我們這部計劃志，是編志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結果，願同志們珍惜它，運用它，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

《阜陽地區計劃志》是建國以後新編纂第一代計劃志書，因資料缺乏，經驗不足，加之編寫人員水平有限，漏編之處難免，歡迎批評指正。

燕廣義

1993年6月17日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记述阜阳地区建国后 36 年间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主要经验。有些章节简要记述了建国前区内经济发展的有关情况。

二、本志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纵写事实。按章、节、目编次。文体采用白话文语体文。章法上只记史实，一般不加议论，寓褒贬于记实之中。

三、本志时限：上限一般始于民国时期，下限一般止于 1985 年（个别数字与内容记述到 1992 年），有些内容追溯至明、清。

四、本志纪年：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和民国的年号，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数字书写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颁布的《关于正式出版物数字书写的暂行规定》。

六、本志计量单位的使用，在新中国成立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建国后采用国务院 1984 年 3 月 4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有关规定。

七、本志书资料来源主要是地委、行署和本委历史文书档案材料，以及老同志回忆录等。所用建国后的各种数字来源于地区统计局。

八、价值指标，除注明外均按 1980 年不变价格。

九、本志记述的区域范围，以现行管辖区域为限，建国后划出管辖区的历史事件，除个别引用已注明外一般不再收入。

十、本志采用第三人称记述。

目 录

序 言	1
凡 例	1
概 述	1
第一章 国民经济管理和各个时期经济发展	18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0—1952)	19
第二节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3—1957)	24
第三节 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8—1962)	28
第四节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63—1965)	32
第五节 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 (1966—1970)	38
第六节 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 (1971—1975)	40
第七节 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 (1976—1980)	45
第八节 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 (1980—1985)	50
第二章 经济结构变化	56
第一节 经济成份的变化	56
第二节 产业结构的变化	62
第三章 计划管理	70
第一节 计划管理体系	70
第二节 计划管理主要内容	72
第三节 综合平衡	76
第四章 基本建设和物资计划的实施	78
第一节 基本建设计划的实施	78
第二节 物资计划分配和供应	85
第五章 计委机构沿革和领导人更迭	90

第一节	行政机构沿革和领导人更迭	90
第二节	计委党组变迁和负责人更迭	94
编后记	96

概 述

阜阳地区位于安徽省西北部，黄淮海平原的南端，区内地势平坦，气候兼有南北所长，温度、降水比北方优越，光照比南方强，光、温、水配合比较协调，自然条件宜农宜耕，盛产粮、棉、油、烟、麻等多种农副产品，又是安徽省西北门户，为豫、皖、苏、鲁四省和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优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阜阳地区是中华民族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以来，勤劳、勇敢、朴实的阜阳人民就生活、繁衍、奋斗在这块土地上，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历史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全区人民在中共阜阳地委和专员公署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使阜阳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立足于改革开放，努力振兴经济，使全区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以及各项社会事业，都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经济实力、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建国前的国民经济状况

阜阳地区历史上，颍、亳两州，南北相望。随着封建政权的更迭而隶属不一，先后形成两个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明朝洪武六年（1372年）颍、亳两州首次并入统一版图，“省谯入亳州，寻降亳州为亳县属颍州”。弘治九年

(1496年)亳县复升为州，与颍州同属凤阳府，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颍州为颍州府，又降亳州为亳县，正式纳入颍州府管辖之内，形成东西200公里，南北350公里的广大地域，今阜阳地区全境，均系颖，亳两州属地。

区内历史上的经济状况，因地处平原，气候条件、地理环境较好，降水量丰富，温度适中，有利于多种农作物生长，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亳州在考古发掘中，就曾发现原始社会的陶纺轮，商代的碳化小麦和战国时期的锄，说明在上古时期，亳州就有了粮食生产和纺织技术。《汉书·地理志》在记载古代豫州（包括阜阳全境）天时地理时说，此地“畜以六扰（即：牛、马、羊、犬、豕、鸡）谷以五种（黍、稷、菽、麦、稻）。描绘了当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

唐朝和北宋初期，颖亳两州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宋史·食货上三》载：“江湖有米、宿亳有麦，”可见当时亳州已是闻名全国的粮产区。唐宋时，亳州与宋州、定州、益州又是全国四大丝织中心，《新唐书》、《宋史》都有亳州绢、纱为贡品的记载。大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称赞：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宋会要辑稿》记述“亳州绉纱设有专市买卖”。说明当时亳州商品丰富，产销两旺，大宗批发的买卖很兴盛。

元朝末年，连年战争，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明朝初期，区内人户稀少，据志书记述：颖、亳两州官府对农业生产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减免赋税、救荒赈济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自明洪武二年至嘉靖二十一年，颍州（不包括亳州）有耕地二十七万一千一百亩；经过六十年，到万历九年耕地增加到一百八十七万九千三百亩；人口由六千多人，至万历三十六年增加至五万八千二百五十二人。

明末清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民族工商业因之逐步发展起来。区内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开始出现新式工业的萌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及其儿子程晓川在阜阳创办榨油厂和两淮织布厂，生产豆油和棉布，远销上海、南京等地；1909年，上海资本家陈春英，投资3万元（银元），在亳州开办同茂顺蛋厂，生产蛋粉。从此，近代工业在阜阳地区境内逐见端倪。

清末民初，因战火不断，兵连祸结，区内农业生产下降，城市工商业也受到摧残。但自1915年以后，社会较为稳定，加上沿海城市资本家来区内办企业和“洋货”的输入，促使了阜阳地区工商业的发展。颍、亳两地城市还出现一些专门经销外国商品的商店和一些外国人办的企业。如亳州“十五号货栈”，专门推销英美烟草公司的纸烟。“元东生煤油栈”，专门经销美国美孚牌的煤油。1917年镇江资本家刘子臣与英国商人合资在阜阳开办大同打蛋厂，1921年至1922年，亳州继外地商人开办裕源蛋厂和织布厂之后，又兴办了福华烟厂和荣记电灯公司。新式工厂采用机器生产，产量大，盈利多，工厂越办越多，后来，亳州织布厂发展到17家，烟厂发展到21家。

这时，商业、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据阜阳旧商会统计，当时建立商业工会有绸布、京广纸糖、汽车、国药、粮业、盐业、皮货、酱园、成衣、竹木、船行、菜馆、估衣等15个组织，394户，资金102万（银）元；县商会直属会员有钱庄、当铺、轮船、打蛋厂、纸烟厂、皮箱、丝行、茶叶行、杂货行、颜料行、浴业、剧院等13个行业28户，530万（银）元；小型商业和前店后厂手工业有印刷、针织、鞋业、笔墨、煤炭、竹木、鞭炮、酒油、梳篦、西药、金银、首饰业、铜铁器业、鲜肉、杂货等12个行业，计400

户，总资金 137 万（银）元。服务行业则有旅社、照像、理发、酒楼、茶社等。

由于阜阳地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农副产品丰富，水路航运便利，也促进了工商贸易的发展。阜阳位于颍河、泉河的汇流处，颍河是淮河的最大的支流，上至河南省周口，下至蚌埠，可终年通航 500 吨轮船，涨水季节，2000 吨大轮通行无阻；北部涡河，上达惠济河至开封，下注淮入江，航船可经蚌埠、镇江、芜锡，苏州直达上海。由于航运的方便，外地巨商豪富纷纷前来经营工商业，开商行、办货栈、搞联营、办商店，更促进了区内经济的发展。据颍、亳两州志书记载，从乾隆年间以后，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省内安庆、徽州、怀宁等地商人，先后来阜阳建立有苏浙会馆、两湖会馆、山西会馆、安庆会馆等 4 处，在亳州建立的同乡会馆更多，共有 30 多处。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大部，区内北部、东部先后沦陷，日本侵略军实行经济封锁，商品流通不畅，特别是 1938 年国民党扒开郑州花园口，妄图以黄河水阻止日军顺沙河南下，造成区内几百万亩良田被淹没，农民百姓流离失所，逃荒外地，农村田园荒芜，农业生产更加落后。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国民党大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加上官僚与资本家互相勾结，囤积聚奇使物价一涨再涨，纸币 20 元，仅换 1 块银元，以后纸币贬值更甚，又出“关金票”、“金元券”，开始 20 元纸币换 1 元“关金票”，50 元“关金票”换 1 元“金元券”，到 1947 年底，1 万元“关金票”只能换 1 块“金元券”，而 10 元“金元券”也换不到 1 块银元。10 年中，国民党统治区货币贬值 216 倍，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有的商店歇业，有的外迁，有的倾家荡产，有的流离失所，广大农民群众经常处于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半饥饿状况。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阜阳地区的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按

可比价格计算，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仅有 89419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4231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 4.73%；农业总产值为 85188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95.27%。

农业生产，因国民党时期农田水利的长期失修，水旱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粮食产量不及战前高，人民生活贫困。1949 年，全区粮食产量 172.46 万吨，平均每亩年产仅有 54 公斤，油料总产 3.01 万吨，平均每亩产 28 公斤，棉花总产量 5385 吨，平均每亩年产仅有 8 公斤。

工业生产建国以前，全区仅有一些简陋的小型手工烟厂，酒厂和从事铁、木、竹等生产的个体手工业。1949 年，在工业企业中，国营企业 6 个，公私合营企业 2 个，私营企业 76 个。

交通运输方面，当时全区仅 1 条从蚌埠到阜阳土路便桥通车的公路，全长 172 公里。陆上运输只有 3 辆烧木炭的私营运输汽车和数以千计的太平车、独轮车；水上运输共计 3575 余艘破烂不堪的木帆船，货运量很低。

商业贸易方面，由于商品流通不畅，货源不足，致使生意萧条。1949 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6281 万元。

二、建国后的国民经济发展

阜阳地区从 1949 年初全境解放起，到 1985 年，已经走过了 36 年历程，在这 36 年里，阜阳地区的人民在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省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进行了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尽管曾经遭到多次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建国前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巨大进步，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国初期，地委

专署针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生产萎缩、农村灾荒严重、城乡交流阻塞、物价飞涨的困境，领导全区人民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生产救灾、治理淮河、兴修水利、生产互助、发展副业和城市工商业调整等工作。

经过建国初期三年的经济恢复，区内工农业生产很快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1951年至1952年在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全区320多万贫雇农分得了土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开展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三反”“五反”斗争，对打击投机倒把、平抑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一系列工作，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并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五”计划刚开始执行时，正值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实施，地委、专署及时引导个体农民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形式，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并对城乡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一五”时期，方针、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制定的比较符合实际，各项生产计划指标安排的比较合理，发展速度、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因此，国民经济发展很快。进入“二五”计划时期，按照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精神，区内制定了“二五”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工农业等各项计划指标，但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经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生产大幅度下降，经济遭到严重挫折。1961年，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区内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10年间，阜阳地区的经济再次遭到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刮起“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邪风，揪斗所谓“走资派”、批“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使经济运行造成严重紊乱，但是，

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和生产，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阜阳地区的国民经济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工农业等各项生产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建国36年来，阜阳地区经济建设的主要成就表现在：

（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1949—198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由8.94亿元，增加到51.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以下同）增长4.77倍，平均每年增长5.13%。农业总产值由8.52亿元，增加到31.17亿元，增长2.66倍，平均每年增长2.78%；工业总产值由4231万元，增加到20.41亿元，增长47.6倍，平均每年增长11.73%，（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46%），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之和）由3.56亿元，增加到47.94亿元，增长12.47倍，平均每年增长7.49%，财政收入（地方预算内）由3047万元，增加到27477万元，增长8.01倍，平均每年增长5.49%。

经济结构，也从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为主，逐步转入农、工、商、建运（输）、服（务）门类齐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比较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49年75.61%，下降到1985年的63.33%，第二产业比重由1949年7.78%，上升到1985年的17.5%，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949年16.6%上升到1985年19.12%。同时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提高，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